

应当加强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文 _ 武力

内容提要：当下中国需要高度重视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重要理论支撑。广义政治经济学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拓展了狭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重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在同一历史时期生产方式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并从中发现共同规律，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点。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需要跨学科合作，需要广阔的历史视野。

关键词：广义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道路

建立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是当前我国理论建设的迫切需要。一方面，新常态下错综复杂的经济问题，仅靠零散的经验总结和照搬西方经济学，已经无法满足实践的需要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问题需要有效的顶层设计来解决。而顶层设计离不开系统理论的指导，这套理论要契合中国的实际，才能解决中国问题。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交往日益密切，现有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西方经济理论基础之上。在这套秩序和话语体系中，我国在经济工作中形成的一些具有本



武力

国特色的、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经验或理论性总结，难免遭到质疑和否定，致使我国在国际交往中经

* 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常陷入被动境地。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也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从理论上掌握话语权，扭转不利处境，进而完善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和规则。而马克思主义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正好能够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和创新发挥基础性作用。

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

众所周知，马克思创立政治经济学之初，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方式，但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并在全世界范围形成影响，政治经济学研究就需要扩大视野，面向全球和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了。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了“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① 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② 如果说狭义政治经济学是以欧美为分析对象，研究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以及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③ 那么广义政治经济学则在时间和空间上拓展了狭义政治经济学。在时间上，它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而且研究之前和之后的人类社会进行生产、交换、分配以及消费的条件和形式；在空间上，它对狭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进行了拓展，不仅包括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包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重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在同一历史时期生产方式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并从中发现共同规律，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特点。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由于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尚未建立，恩格斯对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

向前延伸到前资本主义社会。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论述了早期原始社会阶段和奴隶社会早期国家形成的历史，成为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经典之作。

广义政治经济学在苏联的发展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诞生，广义政治经济学开始延伸到社会主义社会。虽然苏联理论家布哈林曾认为社会主义不存在政治经济学，但这个观点受到了列宁的批判。列宁认为，广义政治经济学及其组成部分——关于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详尽的理论——已经实际存在，所以应当把苏联已存在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按照经济生活的现象和过程的内在联系，根据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本身的方法论要求，继续加以发展并加以系统化。^④ 因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步受到理论界的重视，成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苏联理论界也加强了对前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斯大林提出人类历史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或者说五种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古代的或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其第一阶段）。于是“五种社会形态说”就成为当时国际共运中最具权威的观点。此后，苏联学者运用广义政治经济学对人类历史的五个阶段进行研究，也取得了许多成就。尽管当时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认为广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但是其对封建社会的研究实际上主要聚焦于西欧和俄国，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研究则主要是论述苏联的历史。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2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25页。

③ 余永跃：《恩格斯对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4期。

④ 章良猷编，《苏联经济思想史论文选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5页。

广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

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用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广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逐步受到重视。193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后,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以解释和指导中国的实践,就成为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面临的重要任务。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在周恩来的鼓励下,于1946年开始对广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以中国为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进行探索。1949至1954年,许涤新出版了三卷本《广义政治经济学》,运用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从原始社会一直讨论到当时的新民主主义社会。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缺乏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就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一开始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在解放思想、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过程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很快就发现,苏联教科书中不仅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述存在明显缺陷,而且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也没有展现出世界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别是缺乏对中国的讨论。但是怎样去弥补这种缺陷,不仅受当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实践不足的局限,也受到中国历史科学积累和研究不够的局限。因此,不仅毛泽东没有很好地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当时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我国经济学界曾围绕新民主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进行过探索,但是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受那个时代的局限,未能真正建立起来。

改革开放以后,许涤新决心完成周恩来的嘱托,继续进行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并于1986年写出三卷本《广义政治经济学》,其中第三卷是在他逝世以后于1988年才面世。在这部《广义政治经济学》中,中

国历史占了很大篇幅,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有了比较详细的介绍,成为中国学者研究“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著作。但随着改革开放中重大现实问题的不断涌现以及西方经济理论的东渐,理论界的研究重心逐渐转移。此后对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即使不能说无人问津,也至少是成果寥寥。

广义政治经济学发展面临的机遇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实践的不断深入,以及作为理论经济学重要分支的经济史研究的深入,理论界产生了三个认识分歧:第一,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和研究范式是否具有指导作用?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何而来?第三,它与资本主义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如果不能从理论上回答上述三个问题,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就不能真正建立起来,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信仰就不能真正普遍地坚定起来。而广义政治经济学则是回答这三个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历史验证。

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如果缺乏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正确认识,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中国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来支撑,理论将是不完整,分析框架也是不牢固的。古人在《大学》中曾经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就是这个道理。

而目前中国经济学界被批评的“成果低端化”和“研究碎片化”现象,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缺乏广义政治经济学这个基础学科的支撑所致。

首先,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具有跨学科的特征。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又是经济学、政治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由于它属于研究周期长、知识面要求宽、产出成果慢的学术领域,因此应该引起各个方面的高度重视,在研究课题设置、研究机制、合作方式方面探索一套科学合理的办法。一是要把“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建设“中国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坛

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共识，把相关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凝聚到这一历史任务上来。应当为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程制定出大体的任务和时间表，为各领域研究者的分工合作和任务树立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研究目标，并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尽管我国提倡学术研究自由选题、百家争鸣，但构建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仍需要我们动员全社会的智慧来共同努力。二是要形成能够整合各领域研究成果的机制。建立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项横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和纵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系统工程，需要不断吸收各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所以我们要建立一套更为有效的机制，实现研究成果的交流与整合。三是要在国际交流中扩大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力，让我们的历史和理论“走出去”，并凭借历史和理论自身的魅力吸引更多世界级的优秀学者参与这项研究，由此形成我国在国际历史学和经济学领域的话语权。

其次，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要具有广阔的历史视野。一是广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全球史的视野。中华民

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的规律具有深刻的共同性。越是靠近当代，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越多，特别是在19世纪资本主义全球化以后，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大大增加，而且在发展的步伐和社会形态的演变上，也趋于同步，差异越来越小。因此，如果没有全球视野和对整个人类历史发展共同规律的把握，没有对“五种社会形态”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中的形式多样化和时间上的不同步有基本的认识，就很难把握和准确评估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演变。二是广义政治经济学有“通古今之变”的功能。一般来说，研究现实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学者往往缺乏历史知识和方法训练，而研究历史的学者则往往缺乏对现实问题的了解和新理论方法的掌握。而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则可以打通历史与现实研究之间的通道。E

(编辑 迟晨光)